

贵州

GUIZHOU

世居民族
迁徙史

SHIJUMINZUQIANXISHI

主 编：李平凡 颜 勇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

GUI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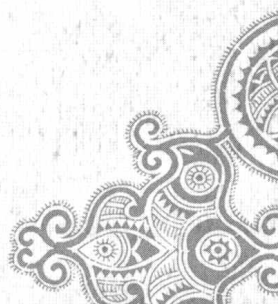
世居民族
迁徙史

SHIJUMINZUQIANXISHI

主 编：李平凡 颜 勇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 / 李平凡, 颜勇主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221 - 09835 - 1

I. ①贵… II. ①李… ②颜… III. ①少数民族 - 民族迁徙 -
研究 - 贵州省 IV. ①K280.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4600 号

书 名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上、下册)

主 编 李平凡 颜 勇

出版人 曹维琼

责任编辑 谢丹华 张 皖 龙建人 唐锡璋 杨雅云

编辑助理 刘向辉

封面设计 熊 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00 千字

印 张 52.2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835 - 1

定 价 168.00 元(上、下册)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刘晓凯
编委会副主任 郝桂华 姚朝雄 徐 飞(常务)
编委会成员 刘晓凯 郝桂华 姚朝雄 黄 平
刘 晖 徐 飞 吴建民 左朝刚
宋 溪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编写组

主 编 李平凡 颜 勇
编写组成员 史继忠 翁家烈 梁永枢 吴 嵘
陈国安 陈世鹏 韩荣培 纳光舜
李平凡 唐合亮 覃东平 颜 勇
曾祥慧 李筱竹 钱 星 周真刚
李霞林

寻找山地高原世居民族的文化源

（代序）

范同寿

一部应时代需求，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严肃论著——《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终于在世人长时间的期盼中面世。用史学界、民族学界同仁的话来说，贵州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四位的省区，早该有这样一部全面、系统，具有相当理论高度，内容翔实可靠的大型著作，这一研究成果的问世令人无比欣慰。《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出版显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历史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其研究成果将对本省区的民族工作、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我们这个宇宙中迄今为止唯一有人类居住的星球上，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频繁，人口的迁徙与流动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但在若干年前，在仅有人行之路而无官修大道的洪荒时代，人们依然能靠双足世代完成着自己的旅行。于是，才有了文化的交流，有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互补，才构成了遍布全球各大洲，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异彩纷呈的文化世界。

早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史地学前辈谭其骧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①这是一段极其精辟的议论。

没有人能离开地理去大讲特讲历史，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任何创造历史的人都不可能悬在半空。地理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是细微而相对难以觉察到的，而在某一方地理环境下从事历史表演的人类群体的变动，却是相当大又相当显著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古代民族的迁徙运动，便不可能铸造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对此，恐怕今天研究地域经济、地域文化、地域社会与地域未来发展前景的学者们，都不能不清楚地有所了解，有所认识。

^① 谭其骧：《发刊词》，原载《禹贡》第一期。转引自葛剑雄：《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始末》，2011年3月14日，见《国际儒学网》。

一位叫博厄斯的美国人类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重要性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社会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①

毫无疑问，博厄斯所说的社会集团中的这种相互经验吸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只有通过民族迁徙与民族互动才能实现。尽管由于地球自身的复杂性，东方与西方，南半球与北半球，甚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民族迁徙，所带来的文化结果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族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过去如此，现阶段如此，将来还会继续。这正是我们研究贵州历史，探讨贵州省情，谋划贵州未来发展，迫切需要一部严谨的《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原因。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②

我们需要研究当今文化，将文化转化为凝聚力与创造力，需要将地域文化有机地汇入经济社会发展中，成为一种软实力与促进各族群众奋发向上的动力，进而使贵州的综合竞争力得以增强，但对贵州文化的研究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各种文化事象的浅层次利用上，更应该夯实文化研究的基础，深入探寻贵州文化的源流。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认识、有所掌握，也才能对贵州文化及与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科学，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说，《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正是这方面一项极具理论价值、社会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

贵州是一片山的世界。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时，曾发出“天下之山聚于云贵”，“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的惊叹。怀揣无数愤懑与不平的他，初到贵州便发出如是抱怨，竟感受不出贵州青山绿水的可爱和气候的宜人，竟没有发现他所在的龙岗山虽然只是一座小石山，土层很瘠薄，但这座山上的石头缝里却长满茂盛的草和树，支撑着满目苍翠的，正是那些嶙峋的怪石？

在笔者看来，阳明先生当年的感受是能让人理解的。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们其实并不懂什么是“史”。《尚书》《周书》《诗经》不过是一批带有档案性质的文献，“六经皆史”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严格说来，中国史学的出现是战国以后的事。但秦汉以来的史官和封建文人们，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总是疏懒于记载我们这片位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西南部的高原

①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②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5日。

山地,以至那些长年生活在灯红酒绿下的达官贵人,总是把贵州想象得无比荒莹与落后,总是把山与“穷”字连成词组来运用,诸如“穷山恶水”、“山穷水尽”之类。

然而,历史与大自然偏偏对贵州这块土地格外眷顾。正是贵州 17 万平方公里域内满布的这些高低错落的大山,数以千计纵横交错的河流,四季宜人的气候,加上古往今来相对平静的社会生境,衍生出了这里的“多彩与神奇”。以至于我们常说的“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这句话,在贵州成了例外。如今,许多在其他地方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在贵州却得以延续,似乎存在一条穿越时空的神秘隧道。不少古老的文化环境在贵州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鲜活的文化生态博物馆;长期形成的山乡异俗,显现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而若干绚丽的民族文化之花,点缀在贵州高原,更形成贵州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文化的大家庭里,贵州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通道地位。这种地位是非其他地区企望拥有便能拥有的社会文化生境,这种文化生境再加上独具特色的自然与社会生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孕育出了一种有着深厚内涵、与众不同特征及连续表现形式的通道文化。进而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内涵与特色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得以巩固。

近几年,包括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营盘山遗址、红营盘墓地、银子坛墓地等在内的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证明,该地文化曾分别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这无疑向我们揭示出:贵州这片土地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的交汇地,绝非偶然。

事实也是这样,在中华民族的广袤国土上,贵州高原一直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从先秦到秦汉,从隋唐到明清,再从近世至当代,无论纵向观察或截取某些历史断面进行分析,我们都不难发现:地处西南腹心,有着得天独厚区位优势贵州,始终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发挥着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通道作用。这正是今天贵州省情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自我认识是自身发展的关键。贵州省情的通道地位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历史财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交通网的建立,贵州高原的这种通道地位更加凸显,而这正为我们提供了实现“工业强省”战略目标的一种优势。

贵州的另一个优势是“多彩”。经过多年的全力打造,“多彩贵州”已成为一块响当当的文化品牌。如今,只要一提起多彩贵州,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绚丽多姿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想到几乎远远超出当代人想象力的山水奇境,想到如梦依稀让人百思不解的诸多历史悬疑,还有那众多如鬼斧、如神功,迄今无人能识、能辨的文化遗存。然而,站在旅游产业的角度,今天我们向游人描述与展示的东西,都只是贵州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只能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观感。导致贵州多彩与神奇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如此令人惊叹的地域文化的内涵何在?它们是如何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形成的?凡此种种,如果不能像《贵州民族迁徙史》这样去深入研究,导游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岂非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解读。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源,只有通过探索寻觅到文化的源,才能对文化本身

做出科学的评估,进而将文化与经济浸润在一起,转化为民族、社会发展的动力。步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是“贵州文化”?它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基本特征与内涵?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百花园里拥有什么样的地位?等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它显示在文化越来越多地展现出经济功能,经济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取向的今天,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已清楚地看到,要改变贵州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落后现状,必须加强对贵州文化的探讨,只有深化对贵州文化的认识,才能充分利用贵州的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实现全省上下对强省与富民的期盼。

如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一样,贵州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时空范围、传承机制与表现形式。而这一切既与贵州高原的地理环境、经济进程、历史轨迹的特殊性息息相关,更与世居各民族的文化源流及历史上的迁徙过程密不可分。在上下数千年漫漫的迁徙途中,不同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演化与冲撞,交融与积淀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贵州文化系统。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出版,事实上正是对贵州山地高原世居民族文化源的一次深度探索,亦是对“贵州文化系统”历史成因的一场深层次研究。

二

客观地说,学术界对贵州民族迁徙历史的研究已有一些时日,在某些特定领域亦曾取得过令人叹服的成果。

在 20 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曾有学者关注到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等论著。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大批高校与科研机构内迁,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向西部转移,学者们就地取材,开展了大量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既有当时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调查,也有学者个人的调查。在贵州,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等论著。其后,1945 年成立的“边胞文化研究会”,也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宣传和改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年的这些努力,无疑为后世关于贵州民族源流与民族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开创与铺垫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贵州民族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毕竟给学术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境。那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社会与历史调查,主要服务于民族识别工作的需要。直到拨乱反正后的 70 年代末,随着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的召开与《丛书》编委会的成立,贵州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贵州的一部分世居民族先后有了自己的简史、简志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系统的贵州民族调查应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与贵州民族研究学

会共同组织的“六山六水”调查为标志。那场历时近20年的调查,是一场系统、全面、深入的民族综合调查,堪称对贵州高原山地民族文化源的深度挖掘。由于众多学者对调查工作的执著、坚持与奉献,该项调查在国内外民族人类学领域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其后用调查成果编辑出版的《贵州民族调查》(20集),《贵州民族志资料汇编》(10集),以及集省内民族学精英编纂完成并公开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族志》,都为今天《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成功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础。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立项与推进,经历了当今所有学术类论著同样的艰难历程。站在一个学人的立场,笔者很能体会到《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编撰人员的辛劳。做学问从来就很难,在社会节奏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今天,静下心来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做学术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如今,国际、国内畅销与受到热捧的出版物,已经极少出自专业学者之手,这几乎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自打“fèn sī”这个英文词流行开来以后,世间接踵出版了一批拥有众多“粉丝”的“名人著作”,无论这些“名人”学的什么专业,干的什么行当,有何种特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惊世骇俗的书籍,并在一些人的帮助与附和下打造出盛大壮观的签名售书场景。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浮躁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通病,在浮躁的年代里能继续以严谨的治学精神,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历程的研究,探寻贵州民族文化之源,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坚持,这种坚持无疑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它告诉我们,无论物质生产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的学问还得继续做下去,而且应该越做越好,唯有如此,学术研究才有希望,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才会有希望。

参与《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编撰的学者是一支多学科、多层次、不同年龄段的队伍。他们当中的一些老学人,曾是“六山六水”调查的组织者与直接参与者。而那是一场以多学科、多民族为主进行的基础性、抢救性综合调查,为编写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简史工作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大量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价值很高的学术研究成果。编撰者中还有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与丰硕学术成果的学者。至于参与编撰本书的大批中青年,尽管资历不深,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上却有许多真知灼见,展示出新一代民族文化学者与时俱进的学术视野与坚实的理论功底。所有这些,都是《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得以如期付梓,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有利条件。

贵州省委、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是《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项目的设计者、组织者与实施者,有了省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指导和鼎力支持,加上民族研究所多年的学术积累及与省内外民族学界的广泛联系,书稿的编写和出版才有了保障。由此看来,作为政府主管全省民族、宗教事务直属机构的民委部门,除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掌握全省民族、宗教情况和动态,协调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重大事宜,努力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首要工作外,组织开展民族与宗教理论、政策等重要课题的调查研究也是一项不容轻忽的重要职能。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民族研究所,固

然也不能将自己关进书斋,缺乏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就当前的社会实际来看,要顺利地完成一个大型课题,这样的沟通与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三

一部学术著作是否过得硬,往往需要从多方面去审视判断。笔者在翻阅《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定审稿时,已经感受到了这部百余万字巨著的学术魄力。

首先,《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这一选题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而这正是我们从总体上评估某一研究项目是否有必要立项,是否有研究前景的主要着眼点。如果选题是前人论述过的,而著作或成果本身又了无新意,缺乏创见,只是一种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亦或理论学术界已经刊发出版过类似的论著,那么,项目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就相应会大打折扣。《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其所以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论著,就在于这一项目极具创意。尽管此前学术界对贵州民族历史上的迁徙问题已有一定关注,省外也不乏学者对此充满浓厚兴趣,曾有一些颇具分量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但面世的论文或著作,大多局限于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的某一历史阶段。在《贵州省志·民族志》之类的民族领域综合性出版物中,囿于出版物的性质,民族迁徙问题只能与民族源流综合在一起叙述,这类著作既属资料性文献,更无法对各民族迁徙的历史展开深入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贵州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多,社会各界和各部门在推介贵州时,因无专门的著述反映贵州各民族迁徙的历史,往往出现口径不一、各执一说的情况。鉴于上述情况,贵州省领导于2009年批示指出:有必要组织撰写一部关于贵州世居民族迁徙的专史,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贵州各民族迁徙的历史以及各民族共同开发贵州、为贵州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反映贵州长期以来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关系。《贵州民族迁徙史》的诞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之下,在省民委的直接领导下,由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省内专家学者撰写完成的。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学术论著的理论价值、社会价值与实践意义将会愈来愈多地得以彰显。

其次,对贵州民族学、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而言,《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出版,都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学术盛举,是对本省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一种推进。我们评价一部论著是否有水平,主要观察其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地位与贡献。与某些学科相比,民族学尤其民族学中专史的研究难度相对要大得多。虽然远在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世界各国就有许多关于不同民族情况的记录。但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秦汉以前的文献和出土物,最多只能给我们一鳞片爪的民族信息,从中获悉少量当时的民族名称、生活礼仪、祭祀和战争等情况。直到秦汉以后的史籍,才给后人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关于民族方面的资料。

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部系统记载西南少数民族的史书是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都有关于西南地区民族史事的记述。尤其列传第五十六中的“西南夷”,对今贵州的记载较多。至今我们关于夜郎及与夜郎相关问题的研究,仍

然不能不以《史记》为最原始、可信度最高的史料。然而靠从《史记》及其后的二十四史中梳理出来的资料研究民族史，显然远远不够。

民族学自 20 世纪初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研究者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要使我国民族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充分运用田野调研这一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在贵州的世居民族中，有自身民族文字的民族并不多，即便是汉民族，由于历史的局限与统治者的偏见，相关文献中的记载也极为简略，这就大大增加了《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编撰难度。在同参与该书编撰工作的学者交流中，笔者获悉这部论著的编撰时间长达两年有余，撰稿人除充分借助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调研成果外，课题立项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田野作业，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这种严格遵循文化人类学研究规律，对民族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充分掌握，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大大提高了这部书的学术水准。

第三，内容的丰满与史料的翔实，是《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一大亮点。笔者从事史学研究 30 余年，每每在搜集史料时遇上这样的烦心事：好不容易寻觅到一部以为可资参考的文献或著作，细读之后却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而一些方志类的出版物本属资料性著述，却也受篇幅、格式的局限，显得十分空洞。足见内容是所有论著的主体，只有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在基础学术理论的指导下，用事实说话，才能成为一项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任何一部论著，再好的选题，再巧夺天工的框架设计，如果内容空泛，充斥着从理论到理论，从推断到推断的个人臆测，即便执笔者的思维再清晰，立论再有创意，文字再流畅，也不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更遑论成为传世著述。《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一大特色，正在于这部长达百余万言，编写难度极大的民族专史，不仅全面反映了贵州 18 个世居民族迁徙的历史，对各民族迁徙历程进行了成片区的系统研究，开创了贵州省民族史研究新的领域，更可贵之处在于该书资料详尽，完全以史事说话，杜绝了空对空的议论，而这正是该书成功的重要基础。

此外，《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尚有许多其他专史类著作所不具备的长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该书从学术的角度为我们严肃地探索了贵州山地高原世居民族的文化源。书中设置的“综述篇”别出心裁，导读式的绪论高屋建瓴，既展示了贵州作为中国西南文化通道的历史地位，又概述了贵州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民族省的历程与形成原因，以历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为切入点，总括性地简叙了自秦汉迄民国年间的贵州民族迁徙与民族状况，落脚点则以“民族与贵州社会经济文化”为论述对象。读者通读全书后，可从中感觉到其真实系统地反映贵州各民族的历史与源流，严谨的治学理念与不少思维上的创新。“汉族篇”的设置，亦是设计者思路敏捷，超乎寻常的一种选择。在已有的关于民族省区的类似著作中，我们往往发现，某些论著为突出民族性，只重点关注少数民族的记述，忽略关于汉民族情况的介绍。而汉族恰恰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数最多的成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离不开汉民族。今日的贵州高原，早已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民族和谐与共同奋斗的格局。要实现贵州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除了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与决策外,更需要各民族齐心协力、携手并进。事实上,《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去展开的。书中不仅分析了贵州高原汉民族迁徙分布的情况,亦对贵州历史进程中汉民族在开发这片土地上的贡献及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展开了分析。这对今后关于贵州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分布的深入研究,无疑很有助益。

如同所有的学术论著一样,当《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不同文化层次、族属、视角的读者也许会产生不同的读后感,这种情况是无从避免的。同一个社会事象,在不同个体身上必然有不同的感受,这本是我们这个世界能给人以精彩纷呈印象的缘由所在,更何况是一部学术类著作。对此,《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的编撰者早已有所知,有所心理准备。他们在谈到这部耗时两载,历尽艰辛与磨砺方始完成的论著时,自己也觉得留下了许多遗憾与不足。这些不足包括: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民族迁徙史又是民族史研究中难度较高的项目,能在上级要求的时限内完成任务已属不易,自然,因为这一原因也影响了论著相关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此前省内关于民族迁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文献资料与调研成果匮乏,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书中某些论点的资料支撑尚欠充分;加上论著篇幅过大,参与人员较多,由于不同民族迁徙内容的相关资料详略有异,作者水平不一,认知上又存在某些歧见,致各分篇质量显现出一些差距,个别分篇文化事象记述较多,迁徙的内容记载不足,等等。凡此种种,无不对本书撰写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全书体例与内容整体性的划一。以至直到书稿杀青,某些内容在表述上,撰稿学者与部分民族成员仍然未能完全达成共识,这不能说不是某种遗憾。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研究成果恐怕也是如此。尽管在编撰者的心目中《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留下了一些未能尽善之处,但这部前所未有的论著填补了贵州省民族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开创了贵州省民族史研究的新领域是毋庸置疑的。该书真实系统地反映了贵州各民族迁徙的历史,探索了山地高原世居民族的文化源,它的出版必将促进各族各界对贵州省情的进一步认识,从文化的角度有力地推动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鉴于此,特写下上述一篇文字,是为代序。

2011年9月18日

总目录

序	范同寿(001)
综 论	(001)
汉 族 篇	(061)
苗 族 篇	(125)
布依族篇	(173)
侗 族 篇	(227)
土家族篇	(267)
彝 族 篇	(303)
仡佬族篇	(389)
水 族 篇	(431)
回 族 篇	(509)
白 族 篇	(563)
瑶 族 篇	(589)
壮 族 篇	(641)
畲 族 篇	(663)
毛南族篇	(699)
仡佬族篇	(725)
满 族 篇	(749)
蒙古族篇	(773)
羌 族 篇	(787)
后 记	(816)

目 录

一、民族迁徙与多民族省区的形成	/003
(一) 汉族与南方四大族系	/004
(二) 几大族系迁徙	/006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008
(四) 单一民族的形成	/010
(五) 明清两代民族状况	/015
(六) 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018
二、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022
(一) 从“西南夷”到“郡国并存”	/023
(二) “和抚”政策与南中民族关系	/024
(三) “羁縻”政策与唐宋民族关系	/026
(四) 元朝统治下的民族关系和“土司制度”	/029
(五) 明代的“安边”政策及土司制度的发展	/031
(六) 清代“改土归流”与民族关系复杂化	/034
(七) 民国时期的民族压迫、同化政策与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037
(八) 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发展	/038
三、民族与贵州社会经济文化	/042
(一) 移民与贵州开发	/042
(二) 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048
(三) 移民导致贵州的多元文化	/054

目 录

一、族源与族称	/063
(一)族源	/063
(二)族称	/064
二、汉至唐代的移民	/067
(一)汉代设初郡,“募豪民田南夷”	/067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姓及避乱“晋民”之人	/068
(三)唐代贵州的汉族人口	/070
三、明代的移民	/071
(一)卫所设置	/071
(二)改土归流	/073
四、清代移民	/080
(一)清代“改土归流”	/081
(二)“开辟苗疆”	/082
(三)增设建置、划定省界	/083
(四)清代汉族移民	/085
五、民国时期的移民	/104
(一)红军转战贵州,贵州人民积极从军参加长征	/105
(二)贵州军队大量开赴前线英勇抗击日寇	/106
(三)抗战时期企业、学校内迁及“难民”	/108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族移民的激增	/11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干部配置	/114
(二)大批科技人员和职工调入贵州进行三线建设	/116
(三)“改革开放”以来汉族人口频繁大量迁徙	/118
结束语	/123

目 录

一、族源与族称	/127
(一)族源	/127
(二)族称	/130
二、上古时期的迁徙	/132
(一)炎黄时期的迁徙	/132
(二)尧舜禹时期的迁徙	/133
三、东部方言苗族的迁徙	/134
四、西部方言苗族的迁徙	/140
五、中部方言苗族的迁徙	/156
(一)从湘西南、桂西北迁入黔东南	/156
(二)雍乾咸同时期苗民起义后迁黔中、黔西南	/163
结束语	/169

目 录

一、族源、族称	/175
(一)布依族族源	/175
(二)布依族族称	/191
二、远古及原始社会时期的布依族社会	/193
三、先秦战国时期的布依族社会	/196
(一)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布依族社会	/196
(二)战国秦汉时期布依族地区的人口流动	/200
四、唐宋时期的布依族	/202
(一)布依族地区羁縻州设置情况	/202
(二)部分姓氏的迁徙之说	/204
(三)布依族地区亭目制度的建立	/205
五、元明清时期的布依族	/208
(一)布依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	/208
(二)雍正五年的“拨粤归黔”	/210
(三)普遍流传的外来说	/211
(四)布依族从贵州外迁的情况	/212
六、新中国成立后的布依族	/215
(一)民族识别	/215
(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	/216
(三)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	/222